

知識天地

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與鄭氏集團研究

鄭維中助研究員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）

人類相互接觸交流的歷史，本可追索至先史時代。但影響當代全球政治與經濟活動的主要因子，則與十五世紀以來，歐洲人所稱「地理大發現」（實則是全球擴張）之後一連串的秩序轉換有關。簡單來說，影響當代社會的兩大變革：「工業革命」與「民主革命」，在十九世紀，已造成了全球連動的「世界體系」。實際上，若無地理大發現後所創造的全球市場連結，以及面對異文化所造成的，對基督教神學的思想衝擊，這兩大變革，也無由對於全球人類社會發揮如此深遠的影響。甚至，若將視野放寬至地理大發現所造成的自然環境變革，重新考慮病菌、糧食作物、牲畜等的交換，對人類社會及環境的衝擊（所謂的「哥倫布大交換」）。不難發現，在人類自我意識的決策範圍內，我們所認定的思想、理念、價值等，在寬廣的全球史因果脈絡中，仍具一定侷限性，現代人不能不以新的視角，重新審視歷史的發展。

在「地理大發現」的時代，臺灣一方面被歐洲人所「發現」，另一方面，則被對岸的漢人給「開發」。如同其他東南亞島嶼上的人民，臺灣原住民被捲入了歐洲人所確立的世界交流網絡中，半強迫的接納了漢人移民，與之共同創造、分享生活資源。在臺灣島上存在國家組織的短暫390年歷史中，此一東西交織的發展脈絡，至今仍對我們產生一定的參考價值。這段在全球脈絡下「近代早期(early modern)」臺灣歷史的發展，也如同其他東南亞地域的歷史研究一般，長期遭到以國族為主體的歷史潮流所忽視。

在二戰結束、聯合國確立殖民地獨立原則之前，殖民地被視為各民族國家天經地義的組成部分。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歷史，被納入各國殖民史內書寫。換言之，在二戰前，東南亞的歷史，僅以一種歐洲文明的配角形態取得存在價值。然而，二戰之後，東南亞各國好不容易在政治上取得獨立，卻又落入美、蘇兩大陣營間，民主與共產對峙的冷戰時期。在戰後經濟復原第一與冷戰意識型態掛帥的時代，歷史研究者想要以較為批判的角度，從全球脈絡視角來審視各地歷史，無疑地，會遭遇許多現實上的困難。這些困難，一直要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發展、乃至於90年代蘇聯瓦解後，才逐步消解。

概略說來，在二十世紀前半期，臺灣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。從而，戰前日本研究者對臺灣歷史的研究，也與其他殖民宗主國的研究者相同，著重早期殖民者（日本人）海外活動與殖民地（臺灣）的關連性。如日本豐臣氏、德川幕府與歐州、東亞各國的往來，給臺灣帶來如何之影響等。戰前的日本學者，如岩生成一、中村孝志等，透過與印尼（當時稱「荷屬東印度」）殖民地檔案館、荷蘭國家檔案館的交流，取得早期臺灣歷史的檔案資料。當我們檢視現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，由岩生教授僱請荷蘭抄寫人員（當時無影印機）所抄錄的史料稿本，其所擇取的內容，也大致符合上述方向。

1980年代後，由於戰後荷蘭所培養的歷史學者，逐漸擺脫殖民地研究的污名，重新啟動「荷蘭海外史」（後稱為「歐洲擴張史」）的研究。新一代的臺灣研究者在曹永和院士的帶領下，也利用這樣的契機，與荷蘭方面合作，共同運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。荷蘭東印度公司曾有效統治

臺灣西南部地區，以臺南為中心，沿海岸南北各約40公里地帶（基隆、淡水不論）。在38年的統治中，留下約三萬頁的檔案。檔案內容以商務為主，本地行政為輔。其中，關於原住民的部分，已由荷蘭歷史學者包樂史（Leonard Blussé）與Natalie Everts-Vrij摘出、出版為《邂逅福爾摩沙》套書。而記載每日行政事宜的《熱蘭遮城日誌》，也已中譯出版。可以說，有關臺灣近代早期歷史的研究，與戰前的研究相比，已邁向新局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在近代早期臺灣歷史中，漢人移民臺灣，乃至於在臺設立國家組織，是後來臺灣發展之所以異於東南亞的分水嶺。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，鄭芝龍、鄭成功、鄭經三代與荷蘭人的交往和衝突，鄭氏在東南亞及日本各地所進行的貿易活動，無疑是臺灣史上，亟需重新梳理、認識的歷史事實。

二戰之前，首先提到歐洲文獻史料中記載的鄭芝龍面貌，與中國史書內的描繪迥異的，是海洋史先驅博克賽（Charles Boxer）。他最先發現鄭芝龍是一個浸潤東西方文化，在環中國海域廣大世界中活動的特殊人物。然而，在中國史的書寫中，卻不成比例的，僅著重於他背棄南明皇帝此一政治抉擇。換言之，這樣的視角，讓十六世紀以來，東南沿海各省人民與東南亞、日本、歐洲各國人的交涉活動，在當時中國士人的選擇性書寫下，漸漸被世人遺忘。其後，在二十世紀中國學界亟欲建立屬於中國國族歷史的敘述脈絡中，也容不下這樣特殊的存在。反之，鄭成功標舉「華夷之分」此一價值選擇，呼應了中國國族歷史敘述裡百寫不厭的主題。鄭成功擊退荷蘭人佔領臺灣，被當成反對殖民主義的「民族英雄」書寫，他一生的具體活動，被由當時的全球歷史脈絡中抽離，只留下純化的道德人格形象。隨著戰前中國國族史的建制化與戰後冷戰體制的發展，臺灣歷史讀物中對鄭氏集團領導者的形象建構，遂遠多於對其具體行動的研究。

正如前述，1980年代之後的荷蘭歷史研究者，開始推廣使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來進行近代早期東亞、東南亞歷史的研究。十六世紀以來，中國沿海各省人民在環中國海域的活動情形，也在各國學者重新審視之下，逐漸被「回憶」起來。敝人於2013年出版的專書 *War,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-1683*³，便是以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為主要基礎，嘗試重新建構鄭氏集團海外貿易活動的研究。以下，臚列較主要的數點結論：

1. 鄭芝龍在接受明朝招撫之前，早已為荷蘭雇用，執行海上查扣中國船隻的任務。而他面對荷蘭與中國官方兩者的態度，幾無差異。
2. 鄭芝龍在就撫之後，並未與荷蘭簽署任何和平條約。雙方是透過貿易利益交換，達成長期停火的共識。
3. 鄭成功與荷蘭合作，出口中國黃金至印度；與此同時，亦與荷方競爭由暹羅出口到日本的鹿皮貿易。
4. 鄭成功奪取臺灣，是為聯合暹羅與日本，迫使荷蘭放棄對東南亞的貿易壟斷，且此舉僅為其更廣大計畫藍圖中的一著。
5. 鄭經的海外貿易與海外出兵，仍是根據鄭成功規劃的藍圖來進行。

由於鄭氏集團的活動遍及環中國海域各地，在使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研究鄭氏集團時，無法如同研究荷蘭人對臺灣的統治一般，僅以一系列臺灣當局的檔案為考察範圍。必須同時瀏覽東印度公司在日本、越南、暹羅、柬埔寨、馬來亞、麻六甲、科羅曼德爾（於印度）等地商館的資料，藉由各地商館所收集的鄭氏集團動向，重新構造其整體活動圖像。又由於鄭成功、鄭經對荷蘭的直接談判對象，是位於巴達維亞（今雅加達）的東印度公司亞洲最高當局，因此，《東印

度評議會決議錄》的相關記載，對於瞭解雙方的往來，至為關鍵。以上數萬頁的檔案，臺灣現在並未有任何機構收藏，必須親自前往荷蘭調閱。所幸，該系列檔案的目錄已經電子化，使研究者可迅速查考相關檔案編號。雖然研究的門檻較高，且消耗時間、精力甚鉅，但研究成果至關重要，並具啟發性，為重新審視臺灣早期歷史必要之投資。

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到的「全球史的因果脈絡」視角，以上種種結論，都要重新放回當時全球歷史的脈絡，方能呈現其重要意義。例如，有關鄭氏集團起落的解釋，與其說是依賴中國朝代興衰的氣數，或是領導者的道德人望高低，還不如說是這群人一度把握住當時早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、乘勢而起，然其後，在關鍵時刻，卻因未能發展出更高度的應變能力，倏忽凋落。而其他的解釋因素，尚且包括突發的颱風、荷蘭人與葡萄牙人於印度的發展、日本的鎖國等，不一而足。各種層面，仍有待歷史研究者從檔案中進一步挖掘。筆者相信，在全球化現象不斷衝擊所有人個人生涯的當下，回顧鄭氏集團歷史，能讓在我們在思考臺灣島上居民個人或整體命運時，產生更寬廣、綿長的視野，以回應時代的挑戰。